

DANGANBIANYANSHEHUIHUALUN
DANGANBIANYANSHEHUIHUALUN

档案编研 社会化论

DANGANBIANYANSHEHUIHUALUN

樊如霞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档案编研社会化论

樊如霞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档案编研社会化论

著 者:樊如霞

责任编辑:李艳萍 lyp4321@ sina.com 电 话:0431 - 5378019

封面设计:张 迅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第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 / 32

印 张:10.625 字数:26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 - 206 - 04412 - 3 / G · 1722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 500 册 定 价: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一门学科的产生、发展、繁荣或曲折、衰落，固然是受诸多社会条件以及学科内在原因制约的，但是，对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需要，或者某个学科远离社会的需要，那么该学科是注定要走向困境乃至衰落的。档案编研学这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也概莫能例外。

档案编研工作是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编研学研究如何围绕一定选题将馆藏档案信息高质优效地提供社会利用，满足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需求的一门学问。档案编研工作是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的重要手段，是档案部门根据社会需求主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主要途径，也是连接档案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因而在档案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与影响，档案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处理事务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副产品，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附带的产物，导致了档案事业一直都处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附属地位。档案编研仅仅被看作为其他各项工作提供服务的条件性、资料性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束缚了档案事业的全面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的发展目标。在这种状况与环境下，档案编研长期一直处在封闭的、为人作嫁的被动状态，从而使档案编研自身拥有的优势与社会性长期难以得到施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逐

步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加快了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推动经济建设的繁荣与发展。档案事业的大门也得以蓬勃开启，在国家开放档案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档案与社会原被窒息的天然联系日渐恢复，迅猛发展。档案工作逐渐走出了严重脱离社会公众的“深闺”，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时代的发展需求。人们日渐清醒地意识到，档案并非站在孤峰野岭或象牙之塔上，而应站在社会群体之中，它与社会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性决定了它必须与时代发展脉搏同跳动。我们必须将档案提升到一个国家文化的价值高度来认识，真正意识到档案事业是维系和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延续与发展的宝库，是“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历史文化，确立档案事业独特的社会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的当代社会，档案编研工作怎样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解决难题，选择出路，这是本书之所以选择档案编研社会化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所谓档案编研社会化，就是要使档案编研工作融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服务社会大众，充分满足社会各阶层、各系统、各领域对档案编研信息需求的过程。换言之，就是档案编研工作应关注社会的需求，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大众所认同、所接受，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档案编研信息的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档案编研社会化要求档案编研者必须眼光向下，从专注于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帝王将相、朝代更替、各种起义、战争以及政府机关部门等档案信息的开发研究和利用，转到关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习俗、礼仪、宗教信仰等档案信息的开发研究和利用，这不仅是本书作者提出档案编研社会化的目的所在，也是档案编研工作性质特点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是由于档案编研信息的来源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它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形成的档案信息，更包括社会各行各业乃至个人形成的档案信息，它是横联百业、纵贯历史的符号记录。另一方面，档案编研信息

输出的终端是整个社会，满足社会大众对信息需求是档案编研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本书着重对档案编研社会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化基础作了系统的分析与阐述，特别是从文化学、传播学、信息学、知识产权等视角重点阐述了档案编研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存在的社会价值，书中还对网络档案编研、档案编研信息网络营销等问题作了分析与研究，这些都是以往教科书中所不曾论及的，也可以说是笔者长期从事该门课程教学实践活动及不断学习积累的一些心得与体会，虽然书中某些观点可能显得有些稚嫩或者不够成熟，但笔者愿以此作为引玉之石，与同行共同切磋与探讨，以丰富档案编研学科理论的建设及推动档案编研实践的发展。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大量参考并引用了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在档案学、文化学、传播学、信息学、出版学、编辑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对这些作者表示敬意与感谢，同时也为不能一一直接表示谢意而致歉。同时在资料引用或研究转述方面如有差错或误解，责任也完全由本作者承担。限于笔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其中疏漏、错讹在所难免，恳请同行专家予以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我国档案编研工作发展历史述略.....	(1)
一、档案编研概念释义	(2)
二、我国古代档案编纂发展的社会动因	(10)
三、古代档案编纂是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一脉 相承的重要纽带.....	(17)
四、二十世纪以来档案编研发展的历史进程.....	(21)
第二章 档案编研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27)
一、档案编研社会化的含义及其体现	(28)
二、档案编研社会化的提出是适应社会价值观念 转型的需要	(29)
三、档案编研社会化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34)
四、档案编研社会化的主要标志	(38)
五、档案编研社会化是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 要求	(43)
六、制约档案编研社会化的主要因素.....	(49)
第三章 档案编研社会化的现实基础.....	(57)
一、档案编研社会化的社会基础	(58)
二、档案编研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73)

三、档案编研社会化的物质基础	(77)
第四章 档案编研社会化的文化动因	(86)
一、正确的档案文化价值观是档案编研社会化的 重要支撑	(87)
二、档案编研主体的文化视野与价值取向	(102)
三、档案编研在文化建设中与文化传承中 的功用	(111)
四、档案编研在文化选择中的价值与特点	(122)
五、档案编研文化的传播与共享	(131)
第五章 大众传媒与档案编研社会化	(136)
一、传播与档案编研的关系概述	(137)
二、传播学理论对档案编研的影响	(146)
三、大众传媒与档案编研传播理论研究	(152)
四、档案编研传播状况与途径选择	(169)
五、优化档案编研传播系统, 促进档案编研 传播功能的发挥	(191)
第六章 档案编研社会化编研主体意识的转型	(201)
一、社会化档案编研主体性的基本特征	(202)
二、社会环境变化对档案编研主体的影响	(211)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编研主体意识的转型	(216)
四、档案编研社会化关键在于编研主体素质 的提高	(228)
五、信息素质在档案编研中的重要作用	(238)
第七章 实现档案编研社会化的主要途径	(248)
一、转变传统观念, 增强创新意识	(248)

二、档案编研社会化的支点——开放化·····	(252)
三、营造良好的编研文化环境，建立人才激励机制·····	(257)
四、增强档案编研选题策划意识·····	(260)
五、档案编研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278)
 第八章 知识产权与档案编研著作权 的保护问题·····	 (300)
一、知识产权与档案知识产权保护·····	(301)
二、档案编研著作权及其归属问题分析·····	(312)
三、档案编研作品著作权的归属问题·····	(320)
 主要参考书目·····	 (325)
后记·····	(328)

第一章 我国档案编研工作 发展历史述略

如果说档案编研学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那么档案编纂活动在我国历史上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说档案是伴随着文字产生而产生的，那么档案编纂则是伴随着档案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与我国文化发展同步。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会，却始终不曾分割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而造成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则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其中档案编纂活动就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早在我国古代的夏、商、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档案编纂活动。从甲骨档案出土的有次序地叠放在档案库内和将档案编次成册，就反映出当时的强烈编纂意识。在夏商周时期，“编纂”与“编辑”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正如档案与图书没有明显区分一样。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之久及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举世瞩目的。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产生于夏朝的文献征信，但一些专家学者根据《尚书》的有关记载推断，殷代已经产生了档案和编有长篇历史文献。我国公元前8世纪前后，简册使用已相当普及，此时档案文献内容之丰富、编辑水平之高已超

过同期的埃及和巴比伦。尽管“编辑”确切始于何时、何人迄今尚无定论，但甲骨文的先右后左的刻写排列规则，金文的精美设计，以及公元前6世纪，孔子根据档案编纂《诗》、《书》、《易》、《礼》、《乐》、《春秋》6部经典著作，并作为教科书向社会广为传播，确是有据可查的史实。由此可以推出“编辑工作”在我国至少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档案编纂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发展时期了。

起始于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六经”的编纂活动，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成熟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它在人类文化缔构中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明确的编纂思想和科学的编纂理论指导下展开的大规模、系统性的档案文献编辑活动，是第一次将档案文献编纂成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书籍的开创之举，也是第一次以档案文献为文化客体进行精神产品生产并将其成果向全社会传播的光辉实践，可以说它是缔构中华档案文化大厦的第一根巨柱。

一、档案编研概念释义

目前在档案学界或档案工作领域里档案编研与档案编纂这两个专业术语同时被广为使用，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其具体概念和含义的解释，所见教科书也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说二者没有明显区别，无论是档案编研工作还是档案编纂工作都是档案工作中重要组成部分，同是开发利用档案信息的有效手段。然而在具体的概念和使用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为了便于后面各章节的论述，因而本题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试作辨识。

（一）关于档案编纂

“编纂”一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如历史编纂、工具书编纂、文献编纂等，它包含诸多具

体的著录方式,如编、选、译、校、注、评、述等都可融于编纂活动之中。50年代在我国将“编纂”概念引入到档案专业的相关课程之中。

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在我国的历史已是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编纂《六经》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在古代,编最初指用来穿连竹简的绳子,到东汉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编,次简也”,即编就是排列竹简;纂开始指五彩的条带,用来束帛成卷。编、纂的目的,一是为了将书简或已写字的布帛集中在一起而不致散乱,二是使书简和字帛保持一定的顺序。编纂作为一个词语最早见于唐代白居易的《河南元公志铭》,文中有“观其著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的语句,其中编纂指组织整理之意。所以编纂就是整理编排,是把相关的事物按照一定的条理组织起来或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使之达到有序化、系统化的活动。编纂的实质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前人成果进行新形式的整理”^①,因此,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实质就是对档案文献内容进行整理的一项工作。但它绝不是简单的从外在形式上进行实体整理,而是从内容上对档案信息知识所进行的深层次整理和加工。可见,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属于知识信息整理工作。

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一性质从没有改变。追根溯源,我国最初对档案文献编纂也正是从对档案文献的整理开始的,孔子编纂《六经》就是起因于他搜集、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保存先秦文化遗产的初衷。所以,我国档案编纂工作实践从一开始就已将整理作为其核心内容。以后各朝从事编纂的动机或目的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编纂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档案文献的整理。如古代西汉刘向、刘歆父子

^① 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对中央官府档案文献的编纂，北宋司马光编纂长编，明朝编纂《永乐大典》，清朝编纂《四库全书》等，都是大规模的档案文献整理活动。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国学门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通过编纂、公布出版等形式分别对清朝内阁大库档案和其他明清档案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两次（50至60年代，我国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档案教育的兴办，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迅速掀起了建国后第一次的档案编纂高潮，为现代编纂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实践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方面的转移，档案事业建设的恢复、发展，开放历史档案方针的确立，我国迎来了编纂活动的第二次高潮。）档案文献编纂的高潮，对历史档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就是一部档案文献整理的历史，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就是专门从事档案文献整理的一项工作。

由于传统编纂活动主要是局限于对历史文献的整理活动，在此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编纂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偏重于档案史料的整理方面，随之而产生的档案编纂理论所研究范围也主要是对档案材料的查找、挑选、考订、加工、编排、注释、评述等方面，如根据韩宝华先生对档案编纂的阐述：“档案文献编纂是编纂者按照一定的题目要求，对档案信息进行搜集、筛选、审核、加工、整序、评介，以档案文献出版物的形式向社会用户提供档案文献信息的工作。”^①这一表述比较偏重于对编纂的具体环节的研究，内容较抽象，严格意义上是狭义上的档案编纂。其主要局限是缺乏从更高的层面去探讨档案编纂在

^① 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已有的理论使档案编纂的视野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当然，毋庸置疑先辈们无论在编纂方法和编纂手段上所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是档案编纂继续发展和壮大的基础，没有前人的编纂实践经验的积累，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档案编纂理论。但也同样应该注意的是任何理论都必须与时代同行，满足日益发展的编纂实践活动的需要，为编纂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其研究内容和范围都应该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档案编纂成果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各项编纂活动作为治理国家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信息资源，如果脱离了编纂所处的时代而仅仅将研究思路局限在具体的方法和手段上，就难以摆脱闭门造车，不被社会关注的尴尬局面，也就难以承担其辅助治理国家传承历史文化的历史重任，从而只能游离与主流文化的边缘。因此，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勇于创新，不拘泥于传统的编纂理论，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编纂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发挥作用，构建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关于档案编研

“编研工作”这个术语，最早见诸于1960年《档案工作》第2期刊载的河北省档案馆的文章《我省档案馆的编写研究工作》中。而真正作为档案馆的一项工作专业用语，则是在1980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档案局《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中的第二部分在规定工作重点时指出的“工作基础较好的档案馆，要着手进行档案史料的编研工作，研究档案内容、汇编档案史料，参加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工作基础较差的档案馆，也要朝着这方面努力。”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上提到“编研工作”一词。以后国家档案局在《档案馆工作通则》及其他一些文件中都提到关于开展档案编研工作的问题，从此“档案编研”一词便被合法地公认，被有关的文件、报告和文章普遍使用，成为

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的一个专业术语。

上述可见“档案编研”一词的使用是当代的事情，它与原来已在广为使用的“档案编纂”同出现在档案工作中，因而，也就有了关于“编纂”与“编研”之别的谈论以及关于编纂工作、编研工作涵义的理解和表述方面的问题。对此问题目前档案界并没有统一认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分歧。如有的认为档案编研就是档案史料编纂；有的认为编纂是编研的一个组成部分，编是指“编纂”，研是指研究；有的认为编研工作则是编辑工作与研究工作的简称；还有的说它包括编纂、编写、研究三个方面，等等。总之，有关档案编研的表述方面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念上的模糊与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学科建设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以便有个比较客观清晰的认识。依笔者所见诸于相关论著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 档案编研工作是以馆（室）档案资料为物质对象，以提供档案信息为内容，以满足社会利用为目的，在深入研究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按专题对档案资料进行收集、筛选、加工、整理，使之转化为不同形式的编研成果，便于社会直接利用的一项档案专业工作。

2. 档案编研是根据一定的选题，在查选档案文献、利用和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对档案信息内容进行分析、综合、浓缩、组合，或对档案信息内容加以提炼、概括、综述，分别加以编、编写、编撰，使之围绕题目，形成档案文献原文汇编等系统性材料、参考资料、检索工具，或述评、综述、史、志等综合性的材料，并以出版的方式或内部刊印的方式，提供利用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利用档案撰写论文与专著；将档案文献以其原文编纂成书；编制各种参考资料和检索工具，如档案馆介绍、全宗介绍、专题概要、专题目录、索引、卡片、

年鉴等,由此可见档案编研比档案编纂的内容丰富得多,故认为档案编纂是编研工作的一个部分。

3. “编研工作是指馆(室)藏档案资料为主要物质对象,以主动提供或报导档案信息内容为主要目的,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一一定的题目范围,对档案文献进行收集、筛选和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加工,使之转化成为不同形式的出版物,供社会或有关方面利用。”^①关于档案编纂与档案编研之间的区别,曹喜琛教授也明确表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与档案馆的编研工作并非是等同的概念。档案馆编研工作完整地说应当包括:利用档案文献撰写论文、著作和编史修志;把档案文献依其原文编纂成书,即档案文献编纂;编制各种参考资料和检索工具,如档案馆介绍、全宗介绍、各种专题概要、组织沿革、会议简介、大事记、年鉴、专题目录、卡片、索引等等。可见,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是档案馆整个编研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②

上述尽管在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通过认真分析其在编研工作的研究对象、内容实质、主要目的和成果形式都有相同之处,特别都强调了档案编研工作最终都要借助媒介形成一定物质形态的编研作品,才能将其成果纳入信息社会的传播交流系统,所以其与编纂工作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笔者以为,无论是“编纂”还是“编研”二者都是对档案信息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式,所不同之处主要是对档案信息开发的程度、类型、范围上有不同侧重点而已,传统的编纂是侧重于对档案史料的整理开发,而档案编研则在内容、范围、手段、形式方面都比编纂概念更加广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编研是广义上的

① 曹喜琛:《档案编研概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页。

② 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46页。

档案编纂，或者说档案编研的内涵包括了档案编纂的内容，它不仅包括对原生档案信息的一次开发，也包括对档案信息的二次、三次开发，当然其基础都离不开对档案信息的研究。“编”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或者说“研究”需要通过“编”来体现。如果说，“研究”是设计蓝图，“编”便就是施工。完全可以这样说，“研究”之意在于“编”，“编”是“研究”的深化与加工。

档案编研实际上不过是一项工作代名词，是档案部门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建立的一项工作。它是档案编纂工作向社会的延伸与发展。编研工作要与时俱进，必须根据社会发展需求，深入挖掘档案信息的内涵，不断拓展编研领域，使档案信息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从档案编研的研究客体上，还是研究对象上以及方式方法上都应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创新，创新是一切事物生存发展的必然前提条件，也是档案编研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与完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成为各项事业发展的方向标。档案事业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于社会大环境而发展，只有适应社会环境的改变才能生存与发展。档案编研作为开发档案信息的重要手段而被推向市场，档案编研成果成为一种文化商品。既然是种商品，必然就必须遵循市场运作的法则，否则就必然败下阵来。因此关注市场需求，关注公众需求，也就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编研所必须关注的新课题。这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档案编研是截然不同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不问市场，编研什么就传播什么，所以我们完全可把重要精力放在对馆藏信息的研究上。而市场经济下，特别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传播媒介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如果说过去传媒传播什么，受众就看什么，那么现在是受众想看什么就选择什么。也就是受众掌握了选择的主动权。因而，作